

#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法学启示

陈敏光

**[摘要]**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认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专政,社会职能是附属于政治职能的次级职能,但发展地看,国家职能呈现出社会化的历史趋势。法作为执行国家职能的工具,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社会性是其发展方向。在新时代背景下,法学理论应“返璞归真”,由此,应提倡和强化政法框架下的法治建设;顺应和加快社会框架下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新时代;国家职能;政法框架;社会框架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8)12-0051-05

法学是经世致用、治国理政的学问,既关涉法治的一般规律,也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在中国,有些人似乎“偏爱”西方法学范式,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西方法学范式所固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所影响;真正体现法学本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反而被淡化了。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在新时代,我们更应坚持并努力建设好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阵地,形成正义且强势的“话语权”,推动法治中国建设。鉴于此,本文力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探究法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为我国法学暨法治建设提供若干启示。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的辩证内涵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本质是阶级专政。从根本属性上说,社会职能是附属于政治职能的次级职能。以发展的眼光看,政治职能将随着阶级的逐步消亡而不断消解,国家职能呈现出社会化的历史趋势。

### (一)国家的社会职能附属于政治职能

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认为,国家是从社会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sup>[1](pp.186-187)]</sup>为此,就需要表面上超脱于各阶级的调停人——国家及其权力介入其中,以缓和这种矛盾、避免社会解体。从表面上看,国家采取了共同体的形式,并且,国家只有更好地执行社会职能才能维系政治职能(阶级统治)。“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sup>[2](p.560)]</sup>但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国家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隐藏在这虚幻的共同体和社会职能背后的乃是国家的阶级本质。作为阶级社会特有的组织,国家是反映统治阶级利益、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机器,所谓的社会职能也不过是打着国家招牌的统治阶级人的职能而已。<sup>[3](p.115)]</sup>也就是说,社会职能是附属于政治职能这一根本职能的次一级职能,并不能代替或者与国家的政治职能并列。<sup>①</sup>

作者:陈敏光,经济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参见刘娜娜:《恩格斯国家职能理论再研究:回应与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

## (二)国家职能社会化的历史趋势

社会职能以社会的存在为前提,故对人类社会而言是永恒的;而政治职能则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与国家或阶级社会相伴而生,是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自行消亡的,并要以社会主义为过渡阶段。随着生产力、社会思想文化水平、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发展,阶级将逐步消灭,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相应地,公共权力也逐步由少数社会成员手中转到大多数社会成员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手中,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写道:“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sup>[12](p.277)</sup>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sup>[12](p.101)</sup>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治职能正在逐步消解,而社会职能却在不断扩大和深化,国家最终复归社会,最终走向“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图景。

## 二、从国家职能理论看法的本质与发展方向

国内法学界已甚少强调甚至是回避法的本质问题,即便有所涉猎,也多是将法的发展方向等同于法的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观。因而,我们有必要重申法的本质,并厘定法的本质与法的发展方向之间的关系。

### (一)阶级性仍是法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sup>[14](p.213)</sup>这是从法与经济社会、法和国家关系角度对法的地位作出的准确定位。法和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从来不能脱离而是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发展变化,且法作为国家

的统治机制,也必然要体现出国家的本质和职能。也就是说,法的本质要回答的是法依附于何种性质的国家政权,而不是法执行何种次级的更为具体的社会职能,更不是那些臆造的“纯粹法学”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观,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法从根本上说是执行国家的政治职能的。当然,这并不排斥法的社会职能或“纯粹法学”方面的研究,这是因为,社会职能附属于政治职能,且法从形式上说区别于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和中介并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在法学经典教材中,“法”被定义为:“法是反映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得到国家强制力保证的、通过赋予社会关系参加者权利与义务的方式实现的规范体系。”<sup>[15](p.26)</sup>该定义很好地突出了法的本质。然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学界对西方法学的借鉴和引入较为仓促,在性质上未对西方法学文明成果和西方资产阶级法学进行有效的区分和批判,在内容上多集中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学理论,较少涉及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学理论。这反而模糊或弱化了法的阶级本质。固然,阶级斗争的革命背景和思维方式早已(也应当)一去不复返,但阶级依然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作为方法论意义的“阶级论”也始终是科学的。现代西方的权力寻租、政府俘获、博弈论等提法实际上只是对该理论框架的丰富和发展,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创新理论”,其立足点无非是马克思早就揭示的根本事实——“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sup>[16](p.275)</sup>更要引起重视的是,现代西方的以上诸论仅是工具性的,资本精英和人民大众都可以用,关键在于其服务于何种性质的政权、指向何种价值目的。

### (二)社会性乃是法的发展方向

从发展的眼光看,国家及其政治职能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社会职能作为任何社

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将随社会的发展而继续存在。从而,与国家紧密联系的“法”也将最终蜕变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社会规则”,人们将借此来对一切有关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包括发展生产、科教文卫、环境保护及建设和管理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等,以此来维护人类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有学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指出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的理论不仅是革命性的,更是建构性的,统治阶级论适用于革命时期,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还是充分体现出社会性的一面,并据此提出基于“三人社会”的契约论,其所理解的法的本质是:“法必然要具备的如此性质:它不仅是现实中的法所显示的性质,也是将来的法所体现的性质;它不仅是法在实际上所体现的性质,也是理想中的法所应当具备的性质;它不仅是体现着法的现在,而且是代表着法的发展方向——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法越是发展,就越是充分地体现出这种性质。如果不是这样,所谓的‘本质’就没有资格叫做本质……因而,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在稳态发展的社会满足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需要而产生的规则体系。”<sup>[7]p.133</sup>诚然,该论符合法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国家最终要复归于社会,国家职能社会化也是历史趋势;且法也只有更好地执行社会职能,国家政权及其政治职能才有更坚实的基础。但是简单地将法的发展方向等同于法的本质却是不当的。与国家相挂钩的法在其蜕变为纯粹的社会规则之前,也仅是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的有意识的产物而已,仍不可避免地打着“阶级烙印”。历史事实也表明,阶级斗争始终存在,只不过是民主竞争、阶层博弈的面纱来掩盖而已。理想不等于现实。坚持法的发展方向正是要消解法的阶级性,实现真正的自由人的共同体,但误将法的发展方向等同于法的本质,却容易忽视真正和根本的改革问题。任凭法的社会性包装得如何好,脱离国家政权的性质终究是虚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幻的,事实上,也只有回答了法的本质问题,法的发展方向才有可能真正明晰起来,法治建设才能真正触及“痛点”。

### 三、政法和社会框架下的法治建设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提醒党员同志,共产党人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就需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时代背景下,法学理论理应“返璞归真”。这就要求法治建设应立足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回归政法框架。

#### (一) 提倡和强化政法框架下的法治建设

众所周知,既没有脱离政治的法律,也没有脱离意识形态的法学。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将法放在政治视野中加以理解,从而对旧法学实现了根本性改造和整体性超越。法既不是神的圣物,也不是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公共意志”,仅是国家职能的工具而已。以研究权力制衡、权利义务配置见长的规范法学或“纯粹法学”如果不能“嫁接”在国家政权性质之上,就不是完整意义的法学。更进一步说,政法框架下的法治建设是第一位的,决定着社会框架下法治建设的根本归属。作为法律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载明:“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sup>①</sup>也就是说,我国的法律要充分体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或国家性质,在根本上从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职能。社会主义既不是“权力为王”,权力暨法律完全根植于社会之需要并赋能于社会;也不是“资本为王”,市场暨法律无不要嫁接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上,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实质意义的平等。不理解这一点,我们的法学就仍然



停留在规范法学或“纯粹法学”这一表层,也就无法厚积薄发、走得更远。不理解这一点,在没有搞清规范法学背后国家实质的情况下,就盲目跟着被包装起来、精致和貌似“普世”的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特别是注释法学跑,就有可能有意无意地模糊或偏离“初心”。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资产阶级从未放弃阶级斗争,如针对俄国十月革命、美苏冷战和后来的形势需要,美国相继出台了《联邦反煽动叛乱法》《史密斯法案》《美国法典》(第18篇第115章专门规定“叛国、暴乱及颠覆活动”),并通过制造舆论妖魔化目标政权、物色代理人培植反对派、炒作热点案事件引发革命导火索来策划各类颜色革命等,而充满人性光芒、完全正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而处于被围剿的守势。<sup>①</sup>

在这样的要求和背景下,政法框架的法治建设应进一步强化而不是弱化,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研究可以也应当更有底气。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政法框架不应庸俗化为权力斗争,其实质是“以人民为中心”,是本真和普世意义上的“人民当家做主”。阶级论也主要是理想价值和理论方法,要同泛化、标签式的阶级斗争相区分,也要避免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经历不当地联系起来。此外,也应当承认法的相对独立性和一定意义的普遍性,不能盲目排外,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法律策略、工具、技术手段等支撑和夯实政法框架。这方面,西方的规范法学暨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等研究范式和实践确实能够更好地赋能赋责于权力、更加清晰有效地界定权利,进而对社会经济产生更好的制度助推力,是值得借鉴和吸收的法学文明成果。形象地说,我们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神”而不是被资产阶级精心打扮起来的虚化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犀利地指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

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sup>[4][p.199]</sup>神形必须兼备,我们所借助的“形”,是剔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的法治一般文明成果。

## (二)顺应和加快社会框架下的法治建设

法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具体形态与社会各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密切相关。从国家职能社会化的角度来看,法治依次经历了以下三种形态。在自然经济时期,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的利益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单方的利益,国家的职能也主要是政治职能,即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对外维护主权。社会职能尽管存在,但淹没于国家威权之中,并不显著,如赋税就主要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以实现阶级统治或直接供统治阶级享受之用,并不具有调节收入分配、调控社会经济的功能。由这一国家性质所决定,法律的主要功能则是维护政治统治秩序,法的体系也表现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不妨称之为“法秩序之法治”。在传统市场经济前后,国家职能发生了社会化的第一次历史转折,并以个人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西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使个人从封建及神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专业商人逐步演变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并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信奉“个人加个人等于社会”的机械主义逻辑、实行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野的经济政治运行模式,通过国家政权在法律上确立私权神圣、交易自由,并主张在经济领域限制国家公权(所谓“王在法下”)以防止其染指市民社会,由此,民商法、宪法等逐步从法的体系中分化出来。在外观上看,该阶段的法治具有控制权力、保障权利等内涵,故被称之为“法统治下的法治”。国家职能社会化的第二次历史转折点则发生在现代市场经济前后,它是以社会为尺度的直接、具体的社会化。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到来,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市场机制之不

<sup>①</sup>参见张刚强:《通往平等之路——马克思主义制度构建诸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54页。

灵、不能和不及等问题也日益突出,诸如信息偏在、社会分配不公、宏观经济失调等,20世纪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石油危机引爆经济滞胀和21世纪的金融危机等无不是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现实反映。在这种背景下,个人主义信奉的法律上的形式平等反而加深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个人利益的极端化反而忽视了共享利益的扩大或侵犯社会整体利益,从而,社会有机体的相对独立性和“从社会促个人”的思维越来越受重视。这就要求国家立足实质正义、以社会为本位,在基本的法治框架内,积极参与经济协调和社会治理,并承担相应的角色责任,防止个人暨资本绑架社会有机体、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和发展,相应地,在法的体系中就出现了以维护、促进社会整体利益为使命的经济法、社会法等。此种法治显然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法统治,而是更侧重于法律本身及其运作的系统性、正当性或德性,即“良法善治”。

根据上述历史逻辑,国家职能社会化沿着社会附着于国家—社会是个人的相加—社会是个相对独立体的脉络而深化和发展,我国也应当结合新时代的具体国情,顺应和加快社会框架下的法治建设。一方面,要“补”传统市场经济和法治一般理论的“课”。既要真正认识到市场暨相关法律制度确实能够形成强大的激励机制,有效配置社会资源,也要正视个人权利不彰、易受“官家”侵害和社会自治能力差、诚信意识单薄、契约精神匮乏等现实问题。在准确厘定、动态调适政府和市场、社会边界的前提下,国家职能要进一步社会化,从“大包大揽”的管理转向培育、引导和服务。另一方面,要正视市场经济和法治的现代性问题。市场是有条件的,也绝不能“包打天下”。从现代市场经济暨现代法治回头看就能发现,勃兴于西方市民社会的个人本位、权利本位,在理论上割裂了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联系和权利义务的辩证关系,走向了另一个

极端:私权的滥用比公权的滥用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于私权借用公权“绑架”社会,也压制了社会整体合力的形成和发展,损害了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状况。事实上,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就开始修正这套原始的市场理论、法学理论,国家也早已通过法律等手段参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和社会保障,国家职能社会化进一步丰富,更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尺度而非个人尺度。因此,在社会框架下进行法治建设就不能止步于正在扬弃的原始市场经济暨相关法学理论,而是要多借鉴各国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的法治一般规律和经验做法,以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真正的共同体为根本方向,来进一步扩展国家的社会职能,这是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sup>[4][p.199]</sup>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反对法学“过度西化”的问题,坚定“四个自信”,努力发掘和整合本土资源,特别是要将德政理念和天下观思维融入现代社会治理中,真正丰富和发展“良法善治”的现代法治形态。

最后,需要强调,社会框架下法治建设是政法框架下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具体延伸,搞好社会框架的法治建设就会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最大政治,而搞不好社会框架的法治建设就有可能逐步侵蚀政治根基(如最近发生的假疫苗事件),这应引起高度重视。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朱景文主编.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7]张恒山.法理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澄宇

and nature and that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Fang Shi-nan)

**Legal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State Function Theory:** Marxist theory of state functions hel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is class dictatorship while social functions are secondary functions affiliated to political ones. The national function tends to be socialized in the history of evolution. Rule of law is a tool to carry out state functions; class nature is its essential attribute; sociality is the direction for its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era, we shall return to the simple truth in legal theories, advocate and strengthen leg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conform to and accelerate leg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social framework. (Chen Min-guang)

**The Party's Literary and Artistic Undertakings Call for Depicting and Extolling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On the Artistic Images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in Mao Ze-dong's Poems:** As an epic of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led by the CPC, Mao Ze-dong's poems create the general artistic imag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which embody personality, practice and cultural image as three main aspects. Mao Ze-dong is good at portraying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various forms, adept at depicting images full of hope and aspiration, skilled in achieving rich effects with symbol and metaphor. Mao Ze-dong's poems exerted great historical impact on the artistic images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nd provided important inspiration for developing the Party's literary and artistic undertakings in the new era: the undertakings shall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take a clear-cut stand in depicting and extolling the Party and people; the Party's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 shall deepen their knowledge about the people's lives, and tell good stories of China and the CPC; they shall uphold cultural confidence, consciously inherit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reate excellent works with national style and in line with world trend.(Luo Si-liang and Lu Zhi-le)

**On "Three New Factors" in Das Kapital and Their Major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 summarized the innovative theory expounded in Volume one of Das Kapital as "three new factors", namely "duality of labor", "surplus value" and "the nature of wage". The three new factors markedly distinguish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from any other previous economic theories, and bears the esse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is paper first respectively outlin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three new factors, and then explains that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factors is not only necessary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also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pillar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Finally, it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of the "three new factors", which constitute "basis", "core" and "ke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u Pei)

**On Socialist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Socialist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refers to the sum of economic rights and obligations regulated by the ruling party for all economic subjects, including the ruling party themselves, on the basis of the fundamental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relations of economic subjects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those relation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ies that exhibit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socialism includ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 and regulate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responsibility of fair distribution for work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ublic-owned enterprises to support and guide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Improving socialist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national enterprises. It also serves as a crucial suppor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ystem in a fair and reasonable direction. Upholding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embracing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and promoting institutional reform, autonomous openness and legal constructions are the fundamental ways to improve socialist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Pang Qing-ming and Du Bin)

**The Essence of a New Round of "Anti-Globalization":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The new round of "anti-globa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war, which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ly finalized, is a new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trend with significant symbolic significance upon its rise. In this regard, we must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framework of single perspective and reflect on the "anti-globalizatio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 terms of economy, it is a response to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greedy nature of capitals; as for politics, it is a sign of the weakening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of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it is a token of alleviating proxy of grass-root and elite classes; with regard to cultures,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irrationalism in western society.(Xu Yan-ling and Zhang Qi-ru)

**The "Charity" of American Foundations: The Inside Stories and Intrinsic Nature:** The "philanthropists" who established foundations in the US are not as selfless as ordinary people think. For mega capitalists, foundations can not only enjoy the benefits of tax relief and wealth transfer, but also obtain enormous capital profits through capital operation in foundations. Meanwhile, the unity of the found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wedded by common interests can als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big capitalists, enhance their profitability and assist the spread of US political diplomacy and cultural values across the world. (Cheng En-fu and Kuai Zheng-ming)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American Ideological Export:** Ideological discours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Western political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those in the US, hold that "ideology", particularly referring to the official values of Communist countries, is a derogatory label in nature which means no more than the bewitch and prejudice of Marxist disciples. The strategy of American ideological export is based on its interests, with basic prejudices of Orientalism and anti-communist purposes.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y of American ideological export includes: constructing an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ideological expor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chieving multidimensional export of cultural ideologies featured by Hollywood films; intervening in news spreading; establishing a three-dimensional offence of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promoting change through economic contacts and pressure; supporting educational exchanges, academic research and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etc. Marxist ideological power is the fundamental source of power for socialistic China to obtain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lization, which functions as the power basis for our found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We must firmly grasp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build up the academic discourse system and research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e the cause of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Jin Jia-xin)

**An Analysis of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Karl Marx:**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200th anniversary of Karl Marx, celebrations on different themes have been held all over the world. Compared with previou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the celebrations in 2018 has been more valued by th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ith more diversified activities. The celebrations vary in different forms for varied themes. In view of the celebr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studies on Marx and Marxism tend to more sophisticated and reality-oriented. A wave of Marxist studies has been opened up worldwide, which expanded the global impact of Marx and Marxism. As for the discussion of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around the world, Marx and Marxism have gradually surpassed socialism and become more cosmopolitan. (Zhang Yi-fan)

(翻译:张剑锋)